

读书不到康成处 安敢高声论圣贤

——试论东汉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与郑玄遍注群经

陈 虎 魏崇祥

摘要: 郑玄生当东汉的乱世,在社会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况下,本着“述先圣之意,思整百家之不齐”的崇高理想,穷毕生精力,遍注儒家经典,据清代学者考证,其一生的著述多达六十余种,“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凡百余万言”。他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融为一家,“囊括大典,网络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在经学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划时代意义。处于乱世多事之秋郑玄,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他本身所具备的素质外,与当时政治形势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关键词: 郑玄; 东汉; 政治文化环境; 变化; 遍注群经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10)04-0001-04

“读书不到康成处,安敢高声论圣贤”,这句诗充分表达了后世学者对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推崇,同时也提示我们在研究郑玄的学术成就时,必须充分注意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对郑学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郑玄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死于汉献帝建安五年(200)。他生当东汉的乱世,在社会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况下,本着“述先圣之意,思整百家之不齐”的崇高理想,穷毕生精力,遍注儒家经典,据清代学者考证,其一生的著述多达六十余种,“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凡百余万言”,其在世时,就因“经传洽熟,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融为一家,“囊括大典,网络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①,在经学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划时代意义。处于乱世多事之秋郑玄,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他本身所具备的素质外,与当时政治形势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政治上,东汉选官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古代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至秦汉时期是一

大变革,原来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代之实行的是察举、征辟这种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秦在统一之前的秦国,就已经开始推行“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②的选拔任用官吏制度,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之后,秦朝的官吏,也多出于军功。西汉建立后,朝廷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朝选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而且这些选举方式有时还可以交互使用。西汉朝廷通过这些选举方式,的确也选拔了不少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恢复和发展,都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西汉时期之所以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能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也和这个时期在较为合理的选官制度下人才辈出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曾经为汉朝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恢复发展起过十分重要作用的上述选官制度,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衍生出很多流弊。如任子制,随着西汉官僚队伍的日益扩大和官员人数的不断累积,选官制度中的任子制也日益发展,到东汉时期这种制度更加兴盛,无论保任者还是保任对象都在迅猛扩大,皇帝唯其所好,诏令特除,任子制也就失去严格的界线。这种“不以德选”、完全依父或兄的官阶荫庇而得官的制度,

①《后汉书·张曹郑列传·郑玄传》,中华书局,1986年。

收稿日期: 2009-06-30

作者简介: 陈虎(1962-), 中华书局编审。主研先秦史。
魏崇祥, 曲阜师大信息技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②《通典·选举一》, 中华书局, 1988年。

虽说被选之人未必全是平庸之辈,但应该说在被选者当中,德才兼备者所占比例还是很小的,其表现出来的弊病很大。实际上,这对朝廷统治本身来说也是非常有害的,所以在西汉时期,一些有眼光的思想政治家,如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前134)曾指出:“夫长吏多出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货,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多也。”宣帝时期的王吉说:“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骄骜,不通古今,至于积功理人,无益于人,此《伐檀》所作为也。宜明选求贤,除任子弟之令。”^①都对任子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由于当时的官吏阶层是这一选官制度的主要受益者,让这些制度的执行者去主动做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事情,这在当时无异于与虎谋皮。尽管汉哀帝时曾一度颁布诏书,废除任子令,但不久由于阻力太大,旋即恢复。东汉皇朝是在豪族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一制度更为盛行,其结果:一是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的吏治;二是客观上促进了东汉以后世官世族制的迅速形成。

再如纳资,秦朝及汉初就有相关记载:秦始皇四年(前243)规定,“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②。西汉文帝时“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③。汉武帝时期,由于连年战争,财政困难,朝廷一方面大卖武功爵,一方面又采取入物补官的临时应急措施,即所谓纳资授官。当时有以入谷补官者,有以入钱赏官者,有以入羊为郎者,有以入财补郎者等等。纳资授官,从本质上来说与卖官没有区别。但西汉时期选官尚未过滥,许多纳资授官者,并不为世人所重。东汉前期,由于朝廷重视吏治,提倡气节,公开卖官的事例尚不多见。但到了东汉的中后期,由于外戚、宦官轮流执掌朝政,吏治败坏,朝廷和各级官吏开始公开卖官鬻爵。汉桓帝延熹四年(161),朝廷开始公开计金卖官,“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④。至灵帝时,卖官规模的更加扩大,为此,朝廷还设立了卖官的专门机构,光和元年(178)“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⑤。注引《山阳公载记》进一步说:“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也就是说,“以德次应选者”也要出钱买官。当时灵帝打算拜羊续为太尉,按例,当时拜三公者,“皆输东园礼钱千万,令中使督之,名为‘左骹’。其所之往,辄迎致礼敬。续乃坐使

人于单席,举缁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资,唯斯而已。’左骹白之,帝不悦,以此故不登公位”。^⑥由此可知,当任职者,不论何人,任何种职位,都一律须去西园办理完交钱手续方能任职。没有去西园办理交钱手续的羊续,还算是幸运的,最后皇帝还是给了他一个太常的官职。很多人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一些人因钱不足,竟至自杀。正常的选官制度已经破坏殆尽,卖官、买官已成风气,吏治败坏已经到如此地步。选官制度是社会政治的晴雨表,选官制度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当时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加之东汉中后期,灾异频发、政治昏暗、幼主嗣位、母后临朝不断,其直接后果导致了外戚、宦官交替擅断朝政大权。由于外戚、宦官操纵朝廷、垄断选举,导致了吏治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社会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也严重扭曲,从而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东汉后期选官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1.选官的限制性法规遭到破坏,选拔人才的标准向外戚、宦官势力和世家大族势力迅速倾斜;2.鸿都门学的设立(汉灵帝光和元年二月),“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⑦,以之代替经学。3.任子制越来越滥。4.买官卖官公行。5.选官混乱,政出多门。6.选举不实,所举非人。这些变化对东汉后期的社会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不仅加速了吏治的败坏,导致门生故吏集团的形成,而且加速了社会风气的颓废趋势。士人阶层中退隐、盗取虚名、浮华势利、拜金主义的风气也大为盛行,世风与士风日益恶化。西汉的选官制度的主体部分如察举、征辟中的孝廉、茂材、贤良方正与文学、明经等,讲究:“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⑧选官多与经学有关,尤其是通晓经学的明经特科的设置,更突显了经学在西汉时期政治上地位的重要,读书人或以明经为博士,或以明经为郎官,后均成为一代名臣。如韦贤、韦玄成父子以及张禹、翟方进等人都以明经先后位至丞相。故当时邹、鲁一带就有“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⑨的谚语。通经可以致仕,这是经学之所以在西汉中后期取得崇高社会地位的原因,也是经学史上今古文之争之所以发生的最深层原因。东汉时期,尤其是东汉中期以后,随着选官制度的日益破败,读书人通过读经进入仕途的路径基本被堵死,使经学在政治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再加之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本身存在的许多学术与政治方面的弊端,使得经学中的“家法”传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①《通典·选举一》。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97年。

③《汉书·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97年。

④《后汉书·孝桓帝纪》。

⑤《后汉书·孝灵帝纪》。

⑥《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羊续传》。

⑦《后汉书·孝灵帝纪》注。

⑧《后汉书·百官志一》注引应劭《汉官仪》。

⑨《汉书·韦贤传》。

这就为东汉后期学者屏弃门户之见、兼通今古文之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为郑玄遍注群经提供了有利的文化氛围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经过汉初一段时间的摇摆、选择之后，因儒家思想固有的思想特质，很快便与汉武帝亟需建立大一统政治思想的要求相符合，于是由董仲舒改造的一种融合阴阳、法家和黄老思想的新儒学便被推到了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董仲舒是汉武帝时期的今文经学大师，他专治春秋公羊学，注重发挥儒家经典的所谓微言大义，构筑了一个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框架，以三纲五常为内核的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这与汉武帝的要求一拍即合，于是儒家学说被定于一尊，并迅速被经学化。不久，又设置了五经博士及弟子员，经学开始成为国家选拔、任用官吏的主要工具。这时经学所用的书籍是用汉代的隶书写成的，其来源基本是西汉初期学者凭记忆录下来的，所以在传授过程中恪守一家之说就成为必然的要求。被立为博士的五经，也是这种恪守家法的经学，同时为维护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既得利益，那些博士和弟子员们也乐于接受和自觉地维护这种学术上严格的家法，这样就可以保障他们通过读经进入仕途。可以这样认为，五经博士的设立，标志着汉学的正式形成。而遍注五经、融合今古文众家之长的郑学的出现，又意味了汉学的彻底解体。所以，我们所说的汉学，并非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与当时的政治生活紧密地扭结在一起的政治学术，读经、通经的目的是为了当官，它实际上发挥着为国家机器培养后备人材的主要职能，可以称之为各级官吏的实习机构。

汉代的经学，无论是今文还是古文，为了顺应当时的社会需要和统治者的意愿，大都主动地浸染于当时社会上盛行的谶纬之学，尤其是今文经学。但这种情况在西汉与东汉时期又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董仲舒在政治稳定、国运昌盛的汉武帝时期开以谶纬迷信讲解经学的先河，大讲灾异谴告和符命，其目的在于使人君惊惧，不要滥施淫威，要谨慎修行以求得上天的福佑。其符命思想也是用来肯定既成的事实，论证君权神授的合理性。到了西汉末年的哀帝和平帝时期，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动荡，政治腐败不堪，人们对汉家政权普遍失去了信心，迫切希望有一个改变，于是谶纬所宣扬的灾异和符命作为危机时代的社会意识便在当时社会上大行其道，并迅速成为各派政治力量争权夺利的有力工具。利用人心思变的社会情绪，各派政治势力编造了大量的符命祥瑞，企图攫取他们觊觎已久的权利和地位。西汉末年的王莽正是利用“天帝行玺金匮图”和“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①的符命图书登上皇帝的

宝座的。宛人李通也是以“刘氏复起，立氏为辅”的图谶劝说东汉光武帝起兵，最后成为了光武的大臣。即便是作为“真命天子”的光武帝，也依然要借助于“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以及“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等政治谶语，才最终成就了东汉皇朝的开国皇帝^②。因而光武帝本人对谶纬迷信是深信不疑的，并于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③，后经过过明帝和章帝的大力提倡，谶纬之学遂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学问，谶纬神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这时，无论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虽然各派经师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证巩固“君臣之正义”和维护“父子之纪纲”宗法伦理的合理性，但他们之间也因各种原因和利益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一些以维护正宗儒学为己任的学者如扬雄、桓谭、郑兴、尹敏、王充、仲长统等，对谶纬之学不断地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谶纬非圣人之言，虚妄乖谬。为了弄出一套规范的说法来统一思想，并联合各派建立一门统一的经学，于东汉建初四年（79）十一月，汉章帝下“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于戏，其勉之哉！’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④《白虎议奏》的成书，就是这次会议的最终结果。《白虎议奏》的出现，使得谶纬正式纳入了正统神学、经学的轨道。在白虎观会议上，汉章帝凭借着皇帝的威严，使今文、古文两派经学取得了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郑玄遍注两派群经提供了某种可能的文化氛围。

东汉的皇帝自汉安帝刘祜开始，大都冲幼即位，朝政大权被外戚和宦官轮流执掌，社会局势严重失控，政治腐败，卖官鬻爵公行。神学的经学其基本职能，乃在于为皇权服务。一方面用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另一方面用来调节皇权内部的各种矛盾，从而维护皇权的稳定，所以它的形成和发展，完全依赖于皇权，其价值和影响不在于它是否符合儒家经典的原义，而在于它是否能与皇权紧密结合，并

①《汉书·王莽传》。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③《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④《后汉书·肃宗孝章皇帝纪》。

有效地履行维护皇权的唯一职能。如果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能够协调配合,并正常运转,这种经学也就发展、繁荣;反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东汉中期以后,皇位的继承和神圣的皇帝,被外戚、宦官玩弄于掌股之间,皇帝身上的神圣光环消失殆尽,皇朝的统治发生了深刻的危机,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在运转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故障。为皇权服务的谶纬神学,面对这些重大变故时,其所张扬的符命和祥瑞,往往被置于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作为官方学术的谶纬经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这是谶纬神学在政治上的堕落。

《诗》、《书》、《易》、《礼》、《春秋》五部典籍,在孔子之前本已存在,孔子对它们进行了整理并用作讲学教授弟子的教科书,因此儒家后学一直以这五种典籍作为自己的学术渊源。但战国时期的其他诸子,也同样从这五种典籍中汲取思想精华。如《荀子·劝学》篇中就有“始于诵经,终于读礼”之说,是泛指各类书籍的,虽也含有“经典”之意,但并无“法定经典”之称。由于汉初,文帝置“经博士”,始有法定经典之意。儒学在汉武帝时期又上升到统治思想的地位,并于建元五年(前136)立“五经博士”,推行“以经取士”,于是这五种典籍便自然地奉为儒家经典,正式称为“五经”而为儒家所独有。自五经博士官设立,儒家经典便成为了读书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读书也就成了学子们在政治上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由之路。汉武帝时期,公孙弘(前200—前121)以布衣治《春秋》,最终为相封侯,使“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①。但进入东汉以后,统治阶级内部宗派斗争日趋严重。世家大族收集一批贫寒士人,并推荐他们做些小官小吏。有些善于专营的人,还有可能从小吏上升为公卿。这种贫寒士人称荐举者为恩主,恩主死,要服三年丧。于是,门生故吏逐渐结成为集团。例如袁绍世代三公,就门生故吏遍天下,势力很大。官吏的选拔和任用,不再通过经学的途径,而是通过征辟之途。士人对于读经,不再那么热心。中期以后,朝廷政治昏暗,吏治败坏,朝廷和各级官吏开始公开卖官鬻爵。读书人的仕途被彻底隔绝,笼罩在经学身上神圣的政治光环逐渐褪去,使大批的儒生产生了悲观失望心理,他们隐居教授,闭门著述,专门从事学术性的经学活动,不再像以前那样把经学当作干禄仕进的手段,《后汉书》的《儒林列传》中就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事例。如陈留东昏(今河南兰考北)人杨伦,“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为郡文学掾。更历数将,志乖于时,以不能人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命。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伦前后三征,皆以直谏不合。既归,闭门讲授,自绝人事。公车复征,逖遁不行”。

①《史记·儒林列传》。

②当时,各地都有许多私人开设的“精庐”、“书馆”,学生多的可达数千人。如王充八岁进书馆,当时书馆中即有学生百余人^③。王充的故乡上虞,不过是个小地方,当时在文化教育上也属于欠发达地区,一个书馆中竟然也有学生一百多人,足见当时读书人之多了。经师如果受到朝廷的征辟,并被任以官职,这在以往可是一种崇高的荣耀,也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在东汉末年情况却完全颠倒了。私学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官学,学术性的经学活动相对于通经致仕,显得更为安全、更有吸引力了。

而这时经学中的派别斗争依然激烈。古文家中在东汉中期以后涌现出了几位大师级的人物,如贾逵、服虔、马融、许慎等。尤其是马融,对东汉时期古文经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马融是汉明帝皇后马太后的侄子,其贵族地位保障了他的经师地位。他学问广博,博通各经,门下有好几千学生,因此古文经学的地位就更高了。今文经学的衰落也有其本身的原因,除前述所论外,今文经学过于繁琐,使得读书人困苦不堪,致使“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④秦延君说,今文《尚书》“尧典”二字,解说竟达十多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字,多至三万字。一部经书的章句,多的可达一百万字,少的也有几十万字。东汉的光武帝自己在学今文经时,也曾吃过这个苦头。他当皇帝后,便令儒臣删节《五经章句》作为太子的课本。桓荣删欧阳氏《书经》,从四十万字删减为二十三万字,桓郁又进一步删减为十二万字。^⑤又,张奂删牟氏《尚书章句》四十五万余字为九万余字。^⑥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今文经的繁琐,人们都不愿意学了。产生于西汉时期的造纸技术,到了东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改进,使得书籍的成书工本降低,流通也更加方便。今文经学章句的删繁就简和东汉时造纸技术的进步,为郑玄通今、古各经,遍注群经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技术条件。

这一切,都预示了经学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在郑玄之前,马融就已经为全部古文经做了注解,郑玄在注释经书时不仅采用了马融的全部古文经注,也采用了当时今文经的某些说法,甚至某些谶纬家的说法注经。如《诗经·大雅·生民》中关于姜嫄感天而生的说法,就是出于今文经学家的解说。郑玄基本上是古文经学派,但他采用了今文经学家的一些观点。由于郑玄善于吸取今文派中的某些经说,于是今文被推倒了。郑学成了天下所崇的儒学。

(责任编辑:陈剑)

②《后汉书·儒林列传·杨伦传》。

③《论衡·自纪篇》,中华书局,1986年。

④《汉书·艺文志》。

⑤《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桓荣附子郁传》。

⑥《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张奂传》。